

女演员之死

【苏】尤·邦达列夫著



女演员之死

〔苏〕尤·邦达列夫著

胥真理译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女 演 员 之 死

【苏】尤·邦达列夫 著

胥真理 译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9.125印张 2插页 217千字

1987年3月第1版

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440

书号：10368·259 定价：1.95元

译者前言

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，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尤·邦达列夫的新作——长篇小说《女演员之死》（直译为《演戏》）的中译本。

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，尤里·瓦西里耶维奇·邦达列夫的名字并不陌生，他的许多作品近年来被陆续译成中文出版。

尤·邦达列夫一九二四年出生于乌拉尔一个职员家庭，卫国战争期间在炮兵部队服役，一九四四年加入苏联共产党，一九五一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，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中篇小说《营请求火力支援》（一九五七年），描写苏军一个营强渡第聂伯河，浴血奋战，钳制敌人强大兵力的故事。《最后的炮轰》（一九五九年），描写苏军炮兵连在波、德交界的小镇截击德军的一场战斗，被评论界称之为“战壕真实派”的代表作之一。

六十年代，尤·邦达列夫发表了长篇小说《寂静》和《热的雪》，后者描写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歼灭被围德军的阻击战，被誉为描写战争的“全景小说”代表作之一。

后来，他致力于道德伦理题材的创作，常常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，对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探讨。获得一九七七年度苏联国家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《岸》，描写了苏军中尉尼基金在卫国战争后期与德国少女爱玛的爱情，评论界称之为“在缓和与共处的条件下……对时代的根本道德伦理问题作了回答”。一九八〇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《选择》，通过两个老朋友在战后对生活道路的不同抉择，表现了热爱祖国主题，对人生的意义、

105/30

幸福的真谛、生与死、战争与和平、艺术的使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。苏联文艺界认为，这部小说和艾特玛托夫的《一日长于百年》（一九八〇年）、冈察尔的《你的霞光》（一九八〇年）是今后苏联文学发展的“定向座标”。

《女演员之死》创作于一九八一——一九八四年，发表于一九八五年。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女演员，遭人嫉妒、攻击，溺水身亡。起用她的著名电影导演克雷莫夫的生活，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：准备开机的影片被迫停拍；流言蜚语传进了妻子儿女的耳朵；平日对他感恩戴德、唯命是从的制片主任，竟趁机敲诈勒索……克雷莫夫对人生的真谛，展开了苦苦探索。从中，我们也不难窥见苏联当今社会的人情世态。

在翻译过程中，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张明辉同志的热情帮助和亲切指导，在此致以由衷的谢忱。

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不妥之处，恳请批评指正。

胥真理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于西安绿园

主要人物表

维亚切斯拉夫·安德列耶维奇·克雷莫夫——著名电影导

演

奥莉加——克雷莫夫的妻子

瓦连京——克雷莫夫的儿子

塔尼亚——克雷莫夫的女儿

柳德米拉——瓦连京的未婚妻

伊丽娜·维尼阿米诺芙娜·斯克沃尔佐娃——青年女演员

维尼阿明·弗拉季米罗维奇·斯克沃尔佐夫——伊丽娜的父

亲

伊凡·克谢诺方托维奇·巴拉巴诺夫——电影制片厂厂长

捷连季·谢麦诺维奇·莫洛奇科夫——制片主任

索菲亚·帕芙洛夫娜·索尼亚——莫洛奇科夫的妻子

列昂尼德·维克托罗维奇·佩斯卡列夫——电影委员会副主

席

阿纳托利·佩特罗维奇·斯季绍夫——电影导演

热尼亚——克雷莫夫摄制组副导演

斯捷潘·叶夫多基莫维奇·古林——电影制片厂汽车司机

奥列格·格里戈里耶维奇·托卡列夫——侦查员

约翰·格里奇玛尔——美国电影导演、制片商

第 一 章

克雷莫夫从机场乘出租汽车出来，一路上觉得身体不舒服，鬓角冒汗，憋得发慌，浆硬的衬衣领子粘在汗津津的脖子上。他几次放下汽车玻璃，把身子仰靠在座背上，希望这样会好受些。这时，夏季的过堂风充满排出的气体热烘烘的气味，吹拂着他湿润的面庞。

他惶惶不安，为这个时辰公共汽车站上、商店里还有这么多闲人感到惊讶（人们到底什么时候工作？）。他看见朝阳在叶丛中、在橱窗玻璃上闪烁，对面街道、橱窗、人行道上红色帆布篷荫影下面放着的小桌，穿着花花绿绿服装的行人，甚至在早起时分就很炎热的太阳底下，象飞转的万花筒，使人目不暇接。可那个好象在骗人的梦境中闪闪发光的旋转着的万花筒，却傲慢地消失了，损害了莫斯科街道的朴素。刚从国外归来，莫斯科的街道总令人觉得郁郁不欢，心头不由得泛起一种亲切感。可过去归来，他没有体验过如此反常的呼吸困难，那种使人恶心憋闷、想哭却哭不出来、几乎窒息的感觉，更使他难受。他不明白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并为这种平白无故的多愁善感觉得好笑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无须说，在殷勤好客的巴黎，一切都妙不可言——六天喜气洋洋的气氛，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接待，安装了空调设备的电影大厅，鸡尾酒会，辩论，夜酒店里娱乐时馥郁芬芳、朦朦胧胧的紫红色，丝绒沙发，舞台上女人白皙的肉体，

清晨仔细刮脸，饮两杯使人精神亢奋的咖啡权当早餐，看电影……还有，最后得了个导演荣誉奖，出乎意料，又在意料之中。整个过程都顺顺当当，受到了厚遇，可是在这些愉快而忙乱的日子里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，象酸辣苦甜一齐涌上心头，排遣不开，简直使他不堪回首。

他捂住眼睛，想重新调好莫斯科生活之弦，调到已经习惯了的节奏。又要进电影制片厂，又要和艺术委员会打交道，又要准备拍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越发百无聊赖。他想了想：“我提前赶了回来，就在家休息两天吧。”

就在这时，出租汽车驶进靠近列宁大街的房子，拐向杨树枝条下面的庭院。当他走进凉爽的砖石大门道，走进很多地方擦破了了的电梯室的时候，看见了熟悉的楼梯台和蒙着褐色人造皮革、前室^①安着响铃按钮的房门，他克制不住折磨得他难受、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感情，为了缓解一下，他不得不在楼梯台上站了一会儿。

他按了连响四次的门铃（家庭密码），侧耳听着，接着又按了一遍，期望听到门背后妻子、女儿或儿子的声音，可是那儿一片寂静，从空荡荡的住宅里传来隐隐约约的簌簌声，看来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亲爱的妻子和孩子就这样幸福地拥抱我，迎接我。”他微笑着，想道。

他用随身带的钥匙开了门，把皮箱拖进了前室，前室弥漫着一股使人觉得亲切的家庭尘土味。在镜子前他看见自己满脸倦容，可是突然觉得，他毕竟意外地受到命运的青睐。是的，他累得精疲力尽，想一个人呆一会儿，酥软无力、无忧无虑地在长沙发上躺一躺，一声不响地翻翻杂志，看看报纸和他不在的时候寄

^① 前室：进门后挂衣帽等物的小房间。

来的信件。

他很快地脱掉西装上衣，在各个房间走了走。很清楚：家里人都去郊外别墅了。整个住宅闷热难当，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，窗帘紧闭，任何地方都不透气，令人感到窒闷。透过窗帘缝隙射进来的光线照在镶木地板、地毯和家具上，厨房的窗户未遮上窗帘，散发着油布发烫的气味，打电话的发票从床头小柜掉到地板上，在太阳晒得很热的地方变得发黄了，半卷成小筒状。

每次，他从国外归来，都觉得象在遥远的地方熬过了虚幻缥缈、任凭生活的魔术师摆布的一段漫长的时间。他被弄得疲惫不堪，只有在和朋友们的交谈中，才能去掉饭店、鸡尾酒会式唠唠叨叨的毛病。不过，这玩艺，有时他不得不勉强为之，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奇心。

可现在，他想从自己身上冲走精神的重负，同时从自己的微笑、理智的废话里冲走游逸的倦意，冲走异国洗脸皂的香味——这种洗脸皂，故意散发出一股女人身上才会有的化学气味，弥漫在巴黎的电影大厅和饭店房间里——总之，冲走已经存在过的一切。

他洗了个冷水澡。水带着春天般生气勃勃的喧闹，哗啦哗啦流着。通向盆浴室的门开着，空荡荡的住宅里好象发出海啸一般的回声。他一边用毛巾认真地擦着身子，一边光着脚在各个房间里走着，赤裸的脚后跟踩在晒热了的地板上，没穿衣服，在餐室里大声说：“好啦，一切终将过去，一切正在过去。”接着，往一只高脚玻璃杯里斟满白兰地，一饮而尽，他被浓烈的酒味呛坏了，倒似乎变得好受了些。

然后，他躺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，查看从塞满了的邮箱里取

出来的杂志、报纸、出席座谈会和参观展览的各种请帖，仔细挑选信件，并不拆阅，只瞅瞅投寄地址，希望碰到一个熟悉的姓氏。眼睛似乎不由自主地楞了一下，他慢腾腾地把一个淡蓝色信封放在小杂志桌的角上，信封上觉得眼生的“内务部管理总局”的机关用纸印记赫然映入眼帘，使他疑窦顿生，惶惶不安。

“这就意味着，又开始了……更确切些说，一切正在继续？”克雷莫夫迟疑了一下，撕开了信封，匆匆看了一遍：请维亚切斯拉夫·安德列耶维奇·克雷莫夫七月四日（就是再过三天！）持身份证或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去侦查员托卡列夫处。地址如下：佩特罗夫卡，三十八号，第二层，第二〇〇号房间。“为什么第二次来函？我已经在电影制片厂里和他见过面。对，奥列格·格里戈里耶维奇·托卡列夫是个有教养、挺聪明的年轻人，留着整整齐齐的短髭。可是，不管我出了什么事，亲爱的奥列格·格里戈里耶维奇，我都不去佩特罗夫卡，我不想让您变成一个影子，为发生过的事情老缠着我。”

他沉思着，把传票放在一边，开始草草阅读对巴黎会演影片的评论。他觉得一分钟之前做出的决定将会受人刁难。他发现自己那部影片的评价有些俗不可耐，有的居然异想天开地把“社会主义道德与西方主人公的精神空虚、冷酷无情”相提并论。

“嘿，机敏的小子们，我们的评论家们，为什么只是这个可怜难看的雏型？”克雷莫夫栩栩如生地想起一位著名美国导演的肥脸，气冲冲地笑了起来。这个美国导演的父亲是个俄罗斯移民，他本人很有才华，但心肠狠毒，在会演中放映了影片《所多玛和蛾摩拉》^①，惊动四座——影片描写一个疯狂家庭的毁灭，象征丧失了慈悲心的人类的灭亡。“我的论敌约翰·格里奇玛尔

^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：传说中的两座城市，《圣经》中记述：这两座城市的居民罪孽深重，上帝耶和华降下大雨，将这两座城市化为灰烬。

会和我一起哈哈大笑一阵。‘正当’，‘道德’，‘高度’——老掉了牙的字眼，却成了我的上帝，被我们拿来当作论据和护身符，把自己从头武装到脚。我们，获选者，使自己变得天使一般完美无缺，什么也不管，把一切恶毒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。”

他已经怒冲冲地开始阅读另一篇评论，那儿又冒出关于约翰·格里奇玛尔影片中性交、淫乱、病态现象的惹人厌烦的语句。他没看完，就一边撇开报纸，一边大声嚷嚷：

“呆小病，真见鬼，呆小病……”

他们一起得奖，一起应邀出席午餐会（两个伟大强国的两位导演），每天晚上看完影片之后就在饭店酒吧间里见面，尽管美国人不能喝得太多，他们还是互请对方大饮特饮威士忌和伏特加酒。应格里奇玛尔之邀，在俱乐部度过了两个夜晚，每次都争论俄罗斯的命运，使他俩对峙的立场导致了彼此的敌意；可与此同时，他俩又被某种东西撮合在一起，也许，是因为对对方都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。

在俱乐部的第二夜，激烈的争辩，放开肚皮的痛饮，以及游艺活动，把人折磨得够呛。清晨看影片之前，他在饭店前厅里觉得头疼，翻着小桌上的《巴黎竞赛》杂志，盼望有个机会使他今天不出席鸡尾酒会，不系勒紧的领带，不听格里奇玛尔伤人的恶毒话，休息休息，喘喘气，晚上无思无虑地沿着巴黎的街道踟蹰踟蹰。大前厅不是法国式的，显出东方式的奢华，铺着厚地毯，成了美国讲排场的镜子，宽大的安乐椅，包着红色合成皮革的长沙发，玻璃门旁边晃动的人影、旅馆看门人的斜面高写字台，压低了的声音，香烟和许多难闻而亲切的气味——对饭店来说，所有这一切都习以为常，克雷莫夫在其他国家不止一次地领略过。他有时用目光扫视熟悉的和陌生的制片商、导演刮得溜光或留着大胡子的面孔（在当今世界上遇到的两类同样多的脸型），扫视

电影明星和人所不知的名人诱人的竞技身姿，她们不管是年轻的，还是打扮得年轻的，都仪态万方，炯炯发亮的眼睛里残留着夜晚的痕迹。可是，不知道什么妨碍了他习惯性的观察，不知是头脑昏昏沉沉，还是镜子深处水银晃眼，他同时看见大伙儿吃过早饭后都聚在前厅里，以为那些人都觉察到他观察的眼神，浑身突然冒汗了。他聚精会神地看着《巴黎竞赛》杂志，就在这当儿，听见他们笑着，傲慢而嘲讽地数说他好奇，没有礼貌，他无权这样目不转睛地瞅他们，他顿时觉得自己脸上几乎被轻轻碰了一下。他从杂志上面抬起头来，看见那群制片商和导演中有人心平气和、神情专注地望着他，这人面熟极了，头发花白，身穿灰色服装，他见过不止一次。“我认识他，可他是谁呢？是谁？”他好象从压得难受的地层里钻了出来，开始慢慢地认出发型、前额、白发、领带，极力用目光找寻这个人，可是距离太远，在暗处目光没碰到一块。人们一动不动地从那儿朝他这边瞅着——出乎意料地冒虚汗，害怕心房憋死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个人象谁……

毫无疑问，幻觉的原因可能是精神过度紧张，他听说过干这一行的人的各种应力，可是却不知道，类似情况常常正是这样。

“不可能，愚蠢透顶，胡说八道！骗人！”他当时就站了起来，把杂志扔在小桌上，象战争年代那样果断，坚定地径直走向站在一群制片商里的这个人。可是穿灰色服装的人已经不在……他的位置上站着法国导演克洛德·麦利耶，这是个干瘦干瘦、青筋鳞鳞的老头，稍微染了色的睫毛短得难看，使他外表显得轻佻。他不无交际界的彬彬有礼，向克雷莫夫鞠了一躬。克雷莫夫看到他那洒了化妆香水还湿津津的、巧妙地梳成秃顶的华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克雷莫夫也鞠了一躬，勉强客气地用法语说：“您好，先生！”他抑制着困窘的感觉，从旁边走向前厅顶头，走向酒吧

间。在那儿，象往常那样，看见约翰·格里奇玛尔在柜台后面表示高兴地挥起一只手：“噢，维亚切斯拉夫，看见你很高兴！”

过了一天，类似的情况出现在飞机上，似乎机上所有外国的东西都过于光怪陆离。每天都精神紧张、身心交瘁，临末，在祖国民航飞机一半空着的乘客舱里，和亲切可爱的服务员在一起，听得见俄语，才快活惬意，才轻松自在……使人惊奇的还有，在这儿的九千米高空，出现了两只苍蝇，在被太阳照成金黄色的舷窗玻璃上爬来爬去。而在天际线，巨大的云群凝重而卷曲，下层云彩平坦坦的，看上去象是大冰洋，透过大冰洋的缝隙，在不可思议的深处，勉强看得见沉没的水底城市，细如发丝的道路，昏暗的森林。

克雷莫夫看着在海上漂流的蓬松的大冰山，看着在舷窗上爬行的苍蝇，想到壮丽的高空、无菌的白云，与这两位旅行家多么不协调，觉得好玩极了。它们或是在舍列梅季耶沃，或是在奥尔利亚机场无意间飞进了乘客舱。怎么飞的？又为什么？

想了想这种不协调和油然而生的“为什么”，意会淋漓，精神酣畅，异常清楚地认定自己被不知什么人的权力从飞机上解脱了，从它的钢铁物质，从他坐着的圈椅上（在空中却保持这个姿势）解脱了，认定自己在白色的荒漠上空，在被罡风和阳光洗涤干净的无边无际的云彩上面飞翔。

“我知道，我出了什么事。”他力图说明自己的处境，说服自己，“在我的脑海里，有过一个可以实现的幻想。我老想有个类似单座直升飞机的飞行器。有时着了魔似的，想在一天末了的时候，离开一切人，腾空而起，在无路的地方飞翔，随便降落在哪儿童话一般的林边草地上。随之，夜幕低垂，草地消失了，森林的寂静往湖面上扩散开来，万籁俱寂……可是为什么我想起这个情景？在饭店前厅，我看见自己——形单影只，虽说衣着阔

绰，善于创造他人的感情，可在国外却是多余的——就变得很不自在……何以解释我现在明显感受到的空气挤压着面庞，胸脯里令人痛不堪言的发怵，以及完全超然物外？”

女服务员用小巧玲珑的鞋后跟支撑着身子，娉娉婷婷，微微摇晃着，带着接待乘客的微笑，端着托盘走到跟前，托盘上放着高脚杯，杯里的矿泉水冒着泡沫。她问他要不要波尔荣矿水^①。她从亮堂堂的乘客舱走到他跟前（瞧，这就是漂亮美观、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物质），而他不想向她报以微笑，就一声不吭，听着亲切悦耳的莺声燕语，瞅着这个看上去十分年轻的服务员。她知道他从哪儿归来，看过他的许多影片。和在遮蔽大地的茫茫云彩上空超脱的飞行中，令人难受的呆然不动的痛苦相片，一切东西大略都变得实实在在。他朝舷窗转过脸去。他不要波尔荣矿水，却要白兰地。克雷莫夫以前从未发觉这种作法后面隐藏着的是孤僻。他把眼睛稍微捂住了一会儿，觉得喷气式发动机的轰鸣好像是恶魔的怒号，牺牲品的哭喊，混杂着雷鸣般的交响乐的管弦乐。克雷莫夫试图捕捉、记住某种固定的音调，可是钢铁奏出的音乐每秒钟都在变化，都在增强，变成难以名状的号啕大哭，震耳欲聋，如同天籁巨响威胁着整个世界。他半睡半醒，继续想着：“伊丽娜……你死了之后，一切都乱套了……”

阳光在舷窗玻璃上晃动着，满头金发的女服务员送来了餐巾，鲜艳娇嫩的嘴唇仍笑吟吟地，又问他要点什么。他没听清，对食品和她这种机械式的微笑不感兴趣。他脑海里立即闪过这样一种出乎意料的想法，喷气式发动机现在突然停住了，飞机在空中发生了严重故障，整个钢铁庞然大物将从高空向下坠落。

这个年轻娇嫩的嘴唇上抹了口红的女服务员，将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地喊叫起来（任何时候，任何人也不能亲吻她的嘴唇了），

① 波尔荣在高加索中部，当地的矿水有治疗疾病的功效。

整个客舱毁灭之前多么可怕、多么粗野地喊叫起来！……“可我呢？”他当时思忖着，“我在那个瞬间会干什么？等着最后的一击，和生活诀别？我一清二楚，我不大喊大叫，也不祈求怜悯……”

他皱了一阵眉头，同时瞅着在舷窗玻璃上爬来爬去的苍蝇，想恢复被破坏了的幸福的心境——如同作梦，象鸽子羽毛在气浪中滑翔，既没有恐惧，又不负责任——多么怡然自得！

“恐惧？我恐惧过吗？”

电话叮铃铃响起来，似乎叩击着他的鬓角，他一周来没打过电话，便不再打盹了，在沙发上往上一跳，身子机械地向小杂志桌上的听筒探了过去。可是立即又把手缩了回去：此时谁也不知道他在莫斯科，而从家里通第一次电话，这已经成了习惯，成了职责，成了惦念的方式。奥莉加不知道他提前两天回来了，所以不会从别墅打来电话。

他又躺下了，幻想着在迷迷糊糊的瞌睡中神游，可是电话铃声又响了，他不得不拿起听筒。

“喂，”他轻声说道，期望听到制片主任莫洛奇科夫精神饱满的声音，就催对方快讲，却惊讶听筒里传来小心翼翼呼吸的声音：“喂，我听着呢，请讲吧，如果已经拨了号码，就别不好意思！”

“是我呀，”一个孩子稚气的声音传进耳膜，接着听到她拖腔拖调地说，“您好，爸爸。您回来啦？我打电话碰碰运气，没料到是您。简直让人意外！我们在别墅。是妈妈让我到浴场旁边自动机电话间给您打电话的。她预感到，您要回来。爸爸，我高兴……”

“坦卡，我亲爱的小狗！”克雷莫夫被感动了，说了起来，突然嗓音嘶哑了，“我没看见你，没听到你的声音，整整一百年

了。我不在，你们生活得怎样？妈妈呢？”

“妈妈？让人吃惊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以为，妈妈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您不在，她寂寞极了。这是悄悄话。别捅出去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每到晚上，她一个人坐在您的书房里，读呀读……啊，可怕极了！”她淘气地尖叫起来，“在这儿，整整一帮人在我后面朝自动机走来，用硬币敲着玻璃。爸爸，我高兴极了，我们等着您！再见！汽车在车房里。我们尽量乘电气列车赶回去。”

“请转告妈妈，我有事在莫斯科耽搁一下，明天来。”克雷莫夫说，听着女儿放在郊外浴汤旁边电话间的听筒继续不断的响声，领略到了奥莉加嘴唇的味道，她那双深色眼睛表示疑问的仰视的目光，见面时她移近嘴唇的当儿柔情脉脉、安然恬静的话语：“你就这样！”他怀着对自己厌恶的感觉想着，他善于不说她说实话，隐瞒会伤害她的事情，她却毫无过错。

他强打精神，从长沙发上跳了下来，一下子扯开了窗帘，朝着杨树叶丛斑斑驳驳的阳光打开了窗户，吸着城市白昼沥青的热气。脸被杨树飞絮搔痒得难受，这样的飞絮在莫斯科整个西南部飞翔，在书房里飘来飘去。克雷莫夫吹落了面颊上的飞絮，走到镜子跟前，做了个鬼脸，为早晨动身去机场之前在饭店里仔细地刮了脸感到满意。在闲暇的日子里，他不喜欢邋遢，在工作期间却放任自己，常常忘记刮脸，爱穿破旧肮脏的短大衣和高领绒线衫。

“我认识他吗？”辨认着镜子里那位满脸倦容、头发渐渐花白、灰色眼睛微微眯缝、有血缘关系却不相识的人，他讥讽地想道，又突然想起清晨饭店前厅，想起另一个人在名人堆里面带倦容，吊儿郎当，衣着阔绰，在这儿却是生人，由于羞愧，由于在巴黎度

过毫无意义的六天，身子战栗了一下。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似乎我过着一种空幻的、失重的生活。我走路，我吃饭，我讲话，我出国，拿任何人也不需要的奖，可魂却丢到那儿了，丢在伊丽娜死去的那个可怕的六月天了。”